

# 放开民营银行要补存款风险课

丁是钉 张本

在中国居民的印象中,银行存款一向是最保险的资产保有方式,尽管存款可能会因通胀有所贬值,但本金和约定的利息还是可以分文不差的拿到手的。

然而,随着首批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可能在下半年挂牌,这种已经固化的概念必须尽早改变。因为一旦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适应其发展的生态环境。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首批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有望在下半年成立。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制将发生重大变革,同时表明官方对民营资本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尽管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适应其发展的生态环境。

首先是制度环境。更多民营银行的设立,既可以为天量的民间资本找到合法的出口,又可以为“求钱若渴”的中小企业开辟一个融资渠道,同时也会丰富我国金融业的结构,为激发其市场活力创造基础性条件。为保证这一开创性金融创新得以落地生根,还需要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或制度创新。

放开存款利率是增加民营银行的竞争力的首要前提。由于民营银行体量小、网点少,同时具有不确定性存款风险,如果没有更高的利息作为吸储工具,与大型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相比,在吸引存款方面显然不具有竞争力。另外,从放贷环节来看,由于其面向的客户以小微企业为主,与针对大企业的贷款业务相比,这部分业务相当于贷款中的零售业务,存在额度小、贷款笔数多的特点,直接造成其贷款业务成本高、风险高。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只有运用更灵活的利率工具,民营银行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

设立“投资人保护条款”是提高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积极性的根本措施。监管机构对于试办民营金融机构的原则是,该类金融机构在用资本承担风险之后,还要由发起人对剩余风险承担连带责任,对存款人进行适当赔付,避免经营失败损害存款人、债权人和纳税人的利益。这也就意味着发起人要对企业经营风险承担无限责任。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会降低债权人和存款人的风险,相应会增加债权人的借贷信心和存款人的存款信心。

但是,如果发起人承担的责任过大,其必然也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避免风险,这既会影响民间资本投资银行业的积极性,也会增加发起人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债权人和存款人利益的风险。事实上,有限责任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设计之一,正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才激发了他们创办企业的积极性。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降低存款人存款风险的必要保障。事实上,不

仅尚未挂牌的民营银行存在破产的风险,就是已经成立多年的大型商业银行也存在破产的风险。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破产的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就有些悠久的历史,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银行破产数目有400多家,在高峰期,平均大约每三天倒闭一家。这期间,成立于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于降低存款人存款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家保险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负责在银行破产时,及时赔付储户被保险的存款。其在后来的发展中,增加了事前预防性监管和早期介入,以其快速、灵活性强的特点,维护着金融系统的稳定。

其次是心态环境。在现实中,中国居民市场经济意识还非常薄弱,自担风险的能力还相当脆弱,存在着严重的政府依赖意识。就连市场经济意识最强的上海,也曾发生过因房产降价而“砸楼盘”的事件。业主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让政府出面,逼开发商保证其利益不受损失。而

曾经发生的证券公司破产、银行产品亏损,甚至是由于参与非法集资而遭受损失,都曾有民众到政府闹事,而这些事件大多数也是最终由政府买单而告终。

由于过去中国银行业实际执行的是隐性全额保险制度,导致储户对于存款的风险意识基本空白。除仅有的且最终尚未定论的海发银行破产案,尚无银行倒闭以及存款风险处置的案例和样本,银行存款绝对安全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如果这种群体意识和心态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一旦有民营银行破产倒闭,就会把所有经济和社会压力都转移到政府身上。由此,为社会公众补上存款风险课已经非常必要。

自担风险民营银行的设立,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程度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民营银行的生存状态也将成为衡量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识。为此,有关方面要着力优化民营银行的政策、制度和心态环境,为民营银行健康发展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

漫评

靠山不稳,站稳才能不趴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权力大小各不同。不识关系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新京报》8月9日消息,多地政府大楼流行摆“转运石”,石狮子成群结队。而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此评价说,张牙舞爪的石兽没有让他们对党政机关增加敬畏,反倒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装腔作势和追名逐利。

长期以来,各地大摆“转运石”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这不仅让人联想到王林事件中企业家们所追逐的圈子以及官员热衷的“靠山石”。因权钱交易而结成私利链条的商人和官员,关系并不牢靠。东窗事发,要么是商人把官员拖垮,要么是商人被自己的靠山压垮。

锐评

## 不问苍生问鬼神是企业家之耻

孟书强

因为马云等各界名流的造访,一直偏居江西芦溪县闷声发大财的“大师”王林突然火了。这位曾引得无数官商、名流竞相前来拜访的“气功大师”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承认自己那一套所谓绝技只不过是“民间杂耍”。

知识经济时代,以马云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们一般都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甚至不乏硕士、博士。这些头顶无数光环的时代骄子们为何会对这样一个江湖术士顶礼膜拜?惹人深思。

马云们不仅仅是好奇和欣赏

对于此次事件,马云回应说,与王林结识是出于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好奇,“即便是魔幻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穷”,“人类很容易以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自以为是地判断世界”,“过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自称大闲人的史玉柱也在微博中结合自身经历称“王林这事大家别太认真了”。

科学有其自身的局限,相信世界上存在科学解释不了或尚不能解释的奇迹和异能,这本身无可厚非。就马云个人来说,如果他本人喜欢对未知的探索,即使王林真的是个骗子,马云去拜访他,与其倾谈合影,那也只是马云自己的事情,算不上多大的事儿,无需“太认真”。

但如果这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

的一种趋势性现象,我们就不能不“太认真”了。遗憾的是,当下中国,江湖术士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对之感兴趣的企业家们也不乏其人。以风水、命理为业的江湖术士们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以创造财富,引领社会为标志的企业家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王林并不是马云结交的第一个“大师”,之前倒掉的“养生大师”李一也和马云素有交情,甚至在李一被媒体揭露批倒之后,马云依然坚称,“李一是一个奇人”。践行着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实践逻辑的也不只是马云。名列世界500强的“世界工厂”富士康在遭遇内部员工频繁自杀后,没有深入检讨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在企业最高领导人郭台铭的授意下,立马邀请五台山的三名高僧深夜赶赴深圳,以“做法事”的方式“超度亡灵”,试图以求助于怪力乱神的方式解决企业自身遭遇的危机。

烧香拜神源于不安全感作祟

如果说这只是个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一项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可能说明更多问题。2008年,中全联企业发展中心郑伟建博士率领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富豪进行的一次较全面的“中国富豪风水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8%的富豪相信做生意是要讲究风水的。每年都要烧香拜神的富豪占99%,其中每年都要到特地点烧香还愿的

富豪占86%;企业和富豪本人有专门风水师的占77%,每年要请风水师的占96%。日前媒体曝出的多地政府大楼流行摆“转运石”中披露,除了各地党政机关外,楼盘等开发商则是其主要客户,而党政机关摆放的“转运石”,亦不乏开发商或者园区所赠。

潜规则盛行,不尽完善的法治,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仍然处于快速扩张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企业正在面对着新一轮的“成长之惑”。企业家移民潮、曾成杰之死,也让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中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无论是青睐大师的马云,还是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柳传志,他们的言行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人选择,他人本无权置评,他们也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可是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作为无数青年人的偶像,他们这样的言行,就不能说是负责任的,甚至可以说是企业家的耻辱。

企业家能力越大则责任越大

不安全感或许在每个企业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存在,可选择青睐江湖术士,选择在商只言商,显然是“抓错了药方”。企业家是一个社会的

精英群体,面对各种问题引起的不安,不是去为改变和根除这种引起不安的根源贡献力量,而是选择拜访江湖术士,不能不让人失望。

一些企业家在送出价值几十万、百万的“转运石”时,不曾眨眼。若说要其持之以恒为消除不安全感,为社会公正与规则透明,法制完善鼓与呼,在这些方面投入同样数量的精力和资本,则不见几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幸运的是这并非中国企业家们的集体共识。在柳传志的在商言商言论之后,诸多企业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已经走到回报社会的阶段了。创业初期为了生存,这个群体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去创造财富。等到财富达到一定量级后,为了体现人生价值、获得公众的尊重,同时也为了让自己的财富更安全,他们会选择帮助贫困人群致富。

靠山要倒,靠神要跑。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行走江湖的术士大师,还是一时风光的腐败官员,都有被揭露查办之日,等待对之寄予厚望的企业家们的也只能是树倒猢猻散。能真正靠得住的只有透明的规则以及完善的法制,这些都需要企业家们的努力。而企业家们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上的优势,使得他们比普通人的责任更重。

以自身推动中国的规则更加透明,法制更趋完善,不仅是消除企业家自身的不安,也是消除生活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不安。中国企业家们应该有这份胸怀和理想。

来论

## 仅靠反垄断重罚难救国内乳企

郭文婧

国家发改委8月7日宣布,合生元、美赞臣、多美滋、雅培、富仕兰、恒天然6家乳粉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限制竞争行为共被罚约6.7亿元,成为我国反垄断史上开出的最大罚单。惠氏、贝因美、明治等3家企业因配合调查、提供重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被免除处罚(8月7日“新华网”)。

毫无疑问,对洋奶企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迟到了,但终究还是来了,来了比不来要好。虽然说其是我国目前在反垄断方面开出的最大罚单,但相对于中国广大消费者过去为洋奶企垄断而支出的高额费用而言,显然多重都不为过。严惩是很有必要的,它至少让广大消费者的价格支出暂时可以更合理一些,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中国奶业一个修正的机会,给了消费者未来更公平消费的期待。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消费者饱受垄断之害,无论是出于保护民族企业,还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强硬的反垄断都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经济领域里,涉嫌垄断的不仅仅是这些洋企,反垄断也不应该存在国外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区别。利国利民的反垄断不仅要面向外企,更多时候要敢于对自己下手。当然,无论如何,近年来包括处罚洋奶企在内的一系列反垄断举措,毫无疑问也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洋奶企被反垄断重罚,除了消费者直接获益,国内奶企是不是也在窃喜呢?因为洋奶企利用垄断盘剥消费者,加上近来曝光的一系列丑闻,毫无疑问会让中国消费者对洋奶企产生更加全面理性的认知,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抛弃对洋奶粉的“崇拜”,这无疑给了国内奶企一个重新获得消费者信任和再次崛起的机会。但问题是,国内奶企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呢?中国的奶企市场能否就此进入一个公平竞争的理性有序发展时期呢?

实际上,过去中国奶企根本就不是被洋奶企打败的,而是屡次出现的丑闻,一步步让消费者抛弃了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拱手将垄断地位送给了洋奶企。在市场竞争中,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市场地位,付出的努力可能比初始要大若干倍。中国奶企只有在与洋奶企的比优中胜出,才能最终重获认可;如果只是互相指责谁的质量更差,除了让消费者寒心和无奈,只会让更多的国内消费者抛弃国内这个市场。要在优质上超越洋奶企,终究要靠更高的标准,靠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的提升。而这些,我们中国的奶企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中国奶企在国内市场的沦落,除了自身的问题,监管部门也难辞其责。正是因为监管不力,导致了国产奶企问题频出;正是因为信息不够透明,才让国内消费者不敢选择;正是因为所谓的保护民族产业,才没有下决心把自身毒疮剜掉。中国奶企只面对着国内的监管,洋奶企的产品,不仅有中国的监管,还有出口之前的监管,如果中国的监管不能拿出比其它国家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措施,谁能保证中国奶企的问题依然会比洋奶企多呢?

打铁得需自身硬,洋奶企被反垄断重罚,给了国内奶业市场一个机会,但能不能抓住机会,不仅取决于中国奶企的自觉意识,也取决于监管部门,只有二者合力,才能让中国奶企脱胎换骨,有重新崛起的可能。中国奶企对洋奶企被反垄断重罚不能只是旁观窃喜,而是要引以为戒。因为中国奶企已经容不得任何意外打击了,否则想要翻身会难上加难。

## 创新两极:颠覆或被颠覆

(上接第一版)

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管理的分工理论正在被双边和多边互动的交易平台所颠覆。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商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和规模在发展。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分工理论下的复杂审批程序,一切都以客户需要为导向,快速传递信息,快速组织生产,快速配送商品,大量的交易都依托互联网平台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淘宝、京东带给消费者的体验是愉快的,但带给实体百货商店的结果却是痛苦的。就像当年沃尔玛在美国疯狂扩张时期,很多夫妻店、百货店全倒了,美国一些地区甚至要立法禁止沃尔玛进来。但形势已不可逆转,这就是毁灭性的创新。

可喜的是,除了电商,一些制造业企业也在借助互联网技术积极寻求变革创新。在2013海尔商业模式创新全球论坛上,张瑞敏首次向外界全面披露了过去8年来海尔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创新探索,其中提到的“人单合一”的文化,就是一种对传统分工理论的颠覆性创新。在传统企业时代,信息不对称的主导权掌握在企业手里。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的主导权已到了用户手里。海尔兼并日本三洋白电之后,8个月实现止亏,其关键就在于海尔把东亚企业文化中的“唯尊是从”改造成了“唯用户是从”。“人单合一双赢”,“人”就是员工,“单”就是员工的用户,“双赢”就是这个员工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与他自身应该得到的价值。建立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文化,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创新不是改良,而是一种颠覆,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超越。没有人能够永久地保持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对目前仍身处困境的企业来讲。生路只有一条,必须以坚韧的毅力不断创新,持续创新,才能摆脱困境,涅槃重生。